

## 堵塞引渡協議漏洞刻不容緩



### 論法論事

江樂士

雖然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但回歸二十多年，香港在這方面未取得任何進展，沒有和內地的司法機關建立有效合作機制安排遣返疑犯，令不少罪犯潛逃法網。相比之下，基本法第九十六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這條文卻促成了20項移交逃犯協議，以及32項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當中很多經已落實執行，有力地打擊了罪案。

早在1998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宣布將與內地就一項移交協議展開磋商，並有望取得突破，只可惜最終不了了之。2007年，葉劉淑儀的繼任人李少光表示希望盡快恢復這方面的協商，但結果有關的計劃再一次被束之高閣。2014年，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特區政府與澳門之間就移交疑犯安排進行的協商已進展至「成熟階段」，但顯然在迫滿力的問題上出現分歧，以致雙方未能落實有關安排。

### 法制差異只是藉口

儘管中國內地與特區的法律制度存在差異，香港遵循普通法，但也不應因此而存在法網漏洞，讓犯罪分子得以逍遙法外。舉例來說，2014年，兩名香港商人因貪污及洗黑錢罪而被澳門司法機關判處5年零3個月監禁，但由於港澳之間沒有移交遣返的安排，他們可以視香港為避難所，逃避刑責。此外，2018年，一名香港女子在台灣遇害後，疑犯潛逃回香港，也因沒有引渡安排而無法被送返台北受審。

自1997年起，香港可以按照原有的行政安排，確保逃犯從內地遣返回港。雖然這個制度值得嘉許，但它只能依靠內地一方作出善意的安排，並不能取代正式的機制。雖然內地自香港回歸以來已將約200名疑犯遣返香港，但香港在這方面卻「無以回報」，無疑會令內地執法人員深感失望。畢竟，司法合作是雙向的，如果外國可以將逃犯送回中國內地，香港沒有理由做不到。

例如2005年，被指在廣東省貪污的中國銀行職員余振東被美國引渡回中國受審。中國頭號通緝犯賴昌星被指在廈門操控一個走私王國，逃稅274億元人民幣後潛逃加拿大。在2011年中國政府保證不會判處死刑後，加拿大隨即把他遣返回國。2018年，浙江省一名涉嫌收受賄款的國家級官員姚錦旗在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後在保加利亞被捕，在首都索非亞一間法院聆訊後引渡回國受審。

儘管香港已經和澳洲、印度和美國等國家簽訂了移交逃犯協議，但竟然和內地其他地區沒有移交疑犯的安排，實在是匪夷所思。這不僅令香港蒙受縱容罪犯之嫌，還會令內地質疑香港緝拿罪犯和維護法治的決心。我們必須打破僵局，而保安局建議修訂「逃犯條例」，俾使香港能與包括中國內地等無引渡安排的地區，達成按個案方式移交疑犯的相關安排，這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步。

### 不容逃犯避過制裁

移交疑犯的程序將由法院監督執行，確保疑犯的利益和安全受到國際認可的措施所保障，才會引渡疑犯回國受審。尤其是以下情形的引渡申請將不獲法院批准：涉案人干犯政治罪行；疑犯被定罪後面臨死刑或不人道的刑罰；疑犯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或民族背景等原因而遭受刑責；兩地的相關法律存在差異；疑犯被遣返受審時可能面臨額外指控；或疑犯被遣返後就已判決的罪名重新受審。

此外，只有干犯46項特定罪行的疑犯才會被引渡受審，而這些罪行在提出遣返申請的地方均會被判處12個月以上的監禁。此外，通緝犯會否被移交將取決於他的行為，而不是他所干犯罪行的法律定義。

保安局的建議現在須由立法會審議，期望獲得通過。這是一個遲來的方案，但卻能補救目前這方面的困局。倘若必要的保障機制到位，中國各地區之間不會再存在法網漏洞。世界上其他國家絕不容許境內有疑犯能逃避法律制裁，我們又豈能容忍這種情況存在。保安局終於出手去糾正這種異況，值得讚許。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

高級法律顧問、犯罪分析員及前刑事檢控專員

## 港青機遇盡在大灣區



### 港事港心

陳仲尼

40年前，一代港人懷揣着滿腔熱情，投身國家改革開放事業，既成就了自己，也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40年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港人再次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相比當初「摸着石頭過河」，這次的《規劃綱要》既有時間表，也有路線圖，清晰指明了香港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尤其對於香港青年來說，更是提供了一個可施展抱負和實現夢想的平台。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青年寄予厚望，去年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便指出，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習主席的淳淳話語，在《規劃綱要》中可以說是充分體現。

《規劃綱要》提出，要建設人才高地，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引進人才環境，實行更積極、更開放、更有效的人才引進政策，加快建設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未來大灣區內的人才融合，必然會有更多的政策引導，對於想要回到內地發展、參與國家建設的青年來說，可謂是絕佳時機。再加上《綱要》中表明，要通過「青年發展基金」幫助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拓展創業空間，鼓勵港澳青年到廣東**

省實習，未來還有機會能報考內地公務員。種種措施無一不是向港青提供一展所長的機會，同時更顯示出，無論是就業還是創業，大灣區都是向港青敞開的廣闊舞台。

香港青年赴大灣區發展，最關注的問題是住房、交通、醫療和教育，而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也盡在《規劃綱要》之中。《綱要》中言，要探索推進在廣東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於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面，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加強跨境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銜接。與此同時，亦提出在廣東設立港澳子弟學校，予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接受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的同等權利。如此一來便解除了後顧之憂，港青在大灣區可更大展拳腳。

還值得注意的是，《規劃綱要》提出，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並鼓勵港澳青年到內地學校就讀。這便有望令香港中小學的愛國教育取得突破和問題。過去內地與香港青年在價值觀特別是國家民族觀存在不同認識，雙方觀點交流、碰撞的機會很少，導致香港青年對內地了解片面。而了解國家，了解內地同齡人的生活，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親身感受。在此政策下，可大大推進香港的愛國教育，其功效遠勝於耳提面命般地強調愛國。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大灣區的機遇已近在咫尺，香港青年需要裝備好自己，才能將機遇牢牢掌握在手中，如參與改革開放的先輩一般，將青春和熱情揮灑在大灣區的土地上，貢獻國家，成就自己。

全國政協委員

# 堅決取締「港獨」履行憲制責任

### 焦點熱議

李繼亭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職責，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當中堅決遏制「港獨」的立場已清晰無比。至於最後的「政府的職責」，「香港同胞的義務」兩個關鍵詞，則分別對應特區政府以及香港市民，這是一次重要的提醒：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不可觸碰的紅線與底線，絕無妥協空間。

公函的第三部分，則進一步指出了對特首的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請行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提交報告」實際上並非首次，特首每年向中央政府述職時，也都要提交工作報告，這次則是就更具體的事務作出新的要求。

### 「提交報告」要求具法律基礎

**必須指出，不論是「公函」還是要求「提交報告」，都有嚴格的法律依據。就「公函」本身而言，中央政府過去已多次就相關問題向特區政府發出。例如，2006年發出的《國務院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管轄的深圳灣口岸區範圍和土地使用期限的批覆》，以及更早之前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的覆函》等。因此，「公函」絕非首次，只是過去使用的頻率並不高而已。**

至於「提交報告」的要求，同樣有堅實的

# 唐偉康離任前的瘋狂？

徐子駿

份報告會否較上一份更嚴厲，唐偉康稱：「我相信按我們去年的評估，這說法成立、正確。」

去年11月14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國會指示美國商務部和有關部門，提供非機密的報告，重新審視應否在科技產品出口香港的政策上，繼續將香港和中國內地視為兩個單獨的關稅區；報告並建議應修改《美國—香港政策法》。這份報告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在香港社會製造不必要的所謂「政治恐慌」，以達到破壞香港的穩定，動搖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的目的。

顯而易見，唐偉康昨日的表態，與美國當局的立場一致。所不同的是，唐偉康一改過去兩年相對低調的作風，站到攻擊並批評中央及特區政府最前線的位置。而其言論是極其的離譜。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不維護「一國」原則，如何能確保「兩制」？在維護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的原則問題上，要求中央及特區政府「讓步」，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相較於以往的言論，唐偉康昨日的言論已到了赤裸裸的「恐嚇」地步。美國要發表什麼「報告」、要作出什麼「結論」，是美國人的自由，但在香港，作為一名外交官，以如此方式去「要挾」、「恐嚇」駐在地政府和人民，是極其罕見的，也是絕不能接受的。

# 反對派又在消費新移民

### 議事論事

聞昱行

更多。

香港勞動力短缺是一個嚴重問題，需要輸入大批外勞解決。新移民是非常重要的勞動力。根據統計，香港新移民（居港未足七年）的年齡中位數（33.9歲），比香港居民要低十歲（44.3歲）。這對香港來說是難得的勞動力。即便有人沒有外出工作，其承擔的家務、照顧老人、教育子女等勞動對香港社會也是有益的緩解。

香港回歸後，除了最初幾年因為金融風暴和非典危機，香港人均GDP有所下降，從2003年開始，人均GDP一直上升。從2003年的23977美元到2017年的46194美元，平均年增長約3%。這在高收入地區中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在這個時期，持單程證到港人數基本平穩。顯而易見，人口增長並沒有帶來平均資源的減少。

當然，有一些資源，在現有情況下相對固定，確實有「攤薄」的現象。比如土地，香港由於是特別行政區，土地很難像內地城市那樣可以有成倍的增長。比如廣州最近幾十年通過合併臨近縣市，版圖從一千平方公里左右擴大到七千平方公里，這種事（目前）對香港來說只能羨慕。但這並不意味着香港的土地資源就真的如此不足。

對比香港和新加坡。面積約720萬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同樣缺乏大規模增長土地的可能，但在過去20年，新加坡人口從380萬增長到560萬，增長180萬，增幅47%。同期香港從650萬

法律基礎。

首先是國家《憲法》層面，第85條、第89條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有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

其次是香港《基本法》層面。如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以及第4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權力……（九）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以上兩點說明，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區，以及需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行政長官，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及領土完整方面，都有強烈的憲制責任。而「港獨」是對《憲法》、《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違反，必須堅決取締。

習近平主席2017年視察香港時曾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亦指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兩制』之分，只有『一國』之責，在香港繁榮穩定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上，沒有『左』『右』之分，只有守護之責。」

香港社會可從此次「公函」中，對自身憲制責任有一個更清晰的了解，這對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資深評論員

市民不知道的是，這到底是唐偉康即將調任前的一次「瘋狂」？還是他受到美國務院的「壓力」？抑或是代表着美國對華對港政策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但無論如何，美國這種「政治恫嚇」是不可能取得其所要的政治效果，因為，影響力是基於其經濟及政治實力，而美國的立場是站在香港市民立場的對立面，或許可以獲得一時的喧囂之效，但是不可能真正獲得讓人接受的。

實際上，就在去年中，唐偉康還不是如此極端立場。他在《明報》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中稱，自己的其中一個主要工作目標，就是加強美國和香港經濟的關係，而在2018年有良好進展。文章結尾，唐偉康表示當檢視美國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有很多令人高興的地方，又指他和其領事館團隊會繼續努力，讓這份成果於下一年更為豐碩。

以上文章結合他昨日的言論，顯而易見兩者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他文中所述是事實，那就不可能存在於「『兩制』未能發揮最大益處」的現象；如果他昨日所言是事實，那麼他去年這篇文章顯然就是在說謊。唐偉康在即將離任香港之前，給港人留下了一副負面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這只會削弱美國在港利益，而不可能達到「拉攏」港人、支持反對派的目的。

# 反對派又在消費新移民

上升到740萬，增長了90萬，增幅14%。新加坡的人口增長顯然大大快於香港。可是，新加坡不但人均GDP增長快過香港；而且儘管目前人口密度稍高於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卻遠在香港之上。成為很多香港人羨慕的地方。可見香港的土地資源不是如此不足，而是規劃不足。簡而言之，香港近年來在開發土地和填海問題上，或者政策之故，或者遇上多方阻撓，嚴重降低了實用土地的增長。導致土地增長滯後於人口增長，這才是香港人覺得資源被「攤薄」的根本原因。

### 反對派「拉布」才是禍源

土地增長滯後，除了導致住房（和公屋）等資源不足，還進一步導致其他公共服務的短缺。香港公立醫院病床十幾年來零增長甚至減少，就是因為沒有新增醫院之故。沒有新增醫院，不是政府沒錢，而是土地短缺、政府規劃缺陷、議會「拉布」阻撓議程，以及建設滯後之故。由於梁振英政府任內啓動多項醫院建設工程，隨着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落成（2020年）、啓德醫院啓用（2021年第一期）、廣華醫院重建（2022年第一期）、基督教聯合醫院擴建（2023年竣工）等陸續投入使用，香港的醫療資源有望得到緩解。

從新加坡的經驗更可以進一步得到啓發。新加坡是一個有完全邊界自主權的國家，它可以自由控制移民人數。那麼為何新加坡還要比香港高得多的速度，增加引入移民呢？為什麼新加坡本地人要外人「攤薄」自己的資源呢？箇中理由，香港右翼人士應該深思。

資深評論員